

《大般涅槃经》在刘宋时代的传承

圣 凯

(清华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084)

摘 要:涅槃学派是传承、研习《大般涅槃经》而形成的一个学系。刘宋时代的涅槃学派,以道生为渊源,所以涅槃师多出於道生系统;由于顿悟、渐悟的争论,慧观门下亦俊杰辈出。道生、慧观门下对《大般涅槃经》的研究,促进顿渐兼容思想在南朝佛教的流行。

关键词:涅槃学派;道生;慧观;顿渐兼容

中图分类号:B94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9-7902(2012)02-0028-08

涅槃学派是传承、研习《大般涅槃经》而形成的一个学系,其研习、弘传《大般涅槃经》的学者称为“涅槃师”,从北凉至隋末唐初,一直兴盛不衰。涅槃学派的传承以道生为第一人,这是从“阐提有佛性”的核心思想来说的。但是,涅槃学派的传承必须从法显译出六卷《大般泥洹经》(以下简称《泥洹经》,涉及通称则用《涅槃经》)开始,在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佛学界,如道生、慧叡、慧严、慧观等人,迅速从鸠摩罗什所传的般若学转向涅槃学。所以,涅槃学派的形成,与鸠摩罗什教团具有密切的联系。昙无讖于玄始十年(421)译出四十卷《大般涅槃经》后,研习者转向此经,促进涅槃学派在北魏与刘宋时期的兴盛,一直至隋末唐初,绵延不绝。

南朝佛教在刘宋元嘉之世,承继东晋末期佛教的法绪,随着姚秦的灭亡、庐山慧远的示寂,佛教中心逐渐向建康移动,如佛陀跋陀罗迎住道场寺,六卷《大般泥洹经》的译出,从而引起南朝佛教对《涅槃经》的研究兴趣;慧严、慧观对《南本》的修治,判教理论的提出与完善,顿悟、渐悟、佛性等理论的争论,从而使涅槃学派在南朝传承不绝。而且,建康佛教是在长安佛教与庐山佛教的基础上,融合了般若与涅槃的思想传统,受到玄学的影响,从而蓬勃发展。在南齐竟陵王时期,成实学派逐渐呈上升趋势,《广弘明集·智称行状》说“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之家,往往间出《涅槃》、《成实》之唱,处处聚徒。”^[1]于是,诸师兼习《涅槃经》、《成实论》成为当时的风尚。

一、道生一系的涅槃师

道生的学说,在当时虽然轰动一时,但是能够真正理解者甚少。其后,他的弟子和祖述其说者绵延不绝,成为涅槃学派的重要一系。

道猷,《高僧传·道猷传》^[2]的叙述与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九《胜鬘经序》^[3]中道攸的生平基本相同,所以道猷即是道攸。道猷为吴地人,在道生座下出家后,随道生入庐山。元嘉十一年(434),道生歿后,悲伤至极,于是隐居于临川郡。元嘉十三年(436)八月十四日,求那跋陀罗与宝云合译出《胜鬘经》,道猷阅经后,对道生的学说与《胜鬘经》一致,感叹说“先师昔义暗与经同,但岁不待人,经集义后,良可悲哉。”于是,注解《胜鬘经》五卷,宣扬道生的遗训,这是《胜鬘经》最早的注释。但是,道猷《胜鬘经注》文字繁杂,所以未流行于世。宋文帝问慧观“谁能继承道生的顿悟义?”慧观回答说“生公弟子道猷”,于是下诏命道猷进京,在宫内齐集义学僧侣,讲述顿悟学说。当时有责难其说者,道猷因为对道生的思想领悟颇深,故对责难者的反驳十分有力,受到了宋文帝的赞叹。孝武帝登位后,大明四年(460),敕为新安寺法主,并为都邑。孝武帝赞叹说“生公孤情绝照,猷公直譬独上”,可见道猷在当时的影响力。元徽年中(473—476)卒,世寿七十一岁。

《高僧传·道猷传》记载道猷有弟子“豫州沙门

收稿日期:2010-09-17

作者简介:圣凯,哲学博士,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。

道慈”擅长《维摩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祖述道猷的义学，删其《胜鬘经注》为两卷。《胜鬘经序》的作者，高丽本记为“慈法师”宋、元、明三本为“法慈法师”。此“法慈”与“豫州沙门道慈”是否为同一人？^[4]道猷隐居在临川，即今江西抚州，豫州即今河南寿县。按在东晋时代另有“豫州沙门道慈”，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九收录道慈法师作《中阿含经序》记载：

晋隆安元年丁酉之岁十一月十日，于扬州丹阳郡建康县界，在其精舍更出此《中阿含》，请蜀宾沙门僧伽罗叉令讲胡本，请僧伽提和转胡为晋，豫州沙门道慈笔受，吴国李宝唐化共书。至来二年戊戌之岁六月二十五日，草本始讫。^[5]

道慈于隆安元年（397）至二年任《中阿含经》翻译的笔受。而且，太元十六年（391），僧伽提婆与慧远翻译《阿毗昙心论》时，道慈亦任笔受。可见，道猷的弟子“豫州沙门道慈”不是东晋时代的道慈。而《胜鬘经序》的作者法慈即是《高僧传·道猷传》中的道慈。或许法慈为豫州人，于是与“豫州沙门道慈”相混淆。

《高僧传·道猷传》末尾附有长乐寺觉世、多宝寺慧整，是当时著名的顿悟论者。《名僧传抄》中收录了觉世的传记，觉世是京兆人，十二岁出家，擅长《泥洹经》、《大品经》，建立二谛义，以不空假名为宗，与慧整齐名。泰始年中（465—471），住在长乐寺，世寿五十九。^[6]慧整精通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，可见觉世、慧整都是鸠摩罗什、僧肇、道生的学系。

依《高僧传》卷七，宝林及其弟子法宝与慧生等三人，皆住在龙光寺，弘扬道生的思想。宝林始在长安受学于道生，后来祖述道生的各种理论，当时人号为“游玄生”。宝林著《涅槃记》，注释《异宗论》、《檄魔文》等，但是《弘明集》卷十四收录了宝林所作《破魔露文》，而同卷收录《檄魔文》是智静所作。法宝是宝林的弟子，住在龙光寺，精通内学、外学，著《金刚后心论》。^[7]从《金刚后心论》的题目可知，这是论述金刚后心豁然大悟的顿悟思想，这与吉藏《二谛义》引用道生的“大顿悟义”即“果报是变谢之场，生死是大梦之境，从生死至金刚心皆是梦，金刚后心豁然大悟，无复所见也”^[8]一致。龙光寺自从道生之后，一直是弘扬顿悟学说的中心，至梁代更为兴盛。

僧璩，吴郡人，俗姓朱（或谓姓朱），在僧业门下出家，博通众经，尤擅《十诵律》。孝武帝（453—464在位）时，奉敕入京师任僧正维那，住中兴寺；持律

严谨，道俗钦服，皇室成员从他受五戒，袁粲、张敷等十分尊崇他。后来，移住庄严寺，大明（457—464）末年示寂，世寿五十八岁，著有《僧尼要事》两卷。^[9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记载：

《十诵羯磨》一卷，或云《略要羯磨法》，《十诵律》出。右一部，凡一卷，宋景和中，律师释僧璩于京都撰出。^[10]

但是，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记载：

《十诵僧尼要事羯磨》二卷，右废帝世大明七年（463），律师释僧璩，于杨都中兴寺依律撰出。亦云《略要羯磨法》，见僧祐《三藏记》。^[11]

僧祐与道宣的记载有矛盾之处，时间、卷数各有不同；但是，道宣又强调《十诵僧尼要事羯磨》即是《略要羯磨法》，难以定夺。陆澄《法论目录》第十一帙有“《述竺道生善不受报义》，释僧璩释镜难璩答”^[12]，这是对僧镜的论难，僧璩以道生的“善不受报义”给予答辩。僧镜是慧观系的涅槃学者，可见僧璩是道生一系的顿悟论者。

僧瑾，少年擅长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等，后来在昙因座下出家，学习三藏经论。至龙光寺，依道生受业。初住治城寺，孝武帝敕为湘东王师，为王授五戒，代昙岳为僧正。湘东王即位后即是宋明帝，泰始元年（465），敕僧瑾为天下僧主。僧瑾建造灵根寺、灵基寺，弘扬禅慧。宋明帝晚年，颇多忌讳，僧瑾多有劝导。元徽年中（473—477）卒，世寿七十九岁。^[13]僧传中虽未明记僧瑾弘扬道生的学说，但是他为道生的弟子，所以亦可能为顿悟论者。

道生的学说在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，由于理解的困难和渐悟一系的压迫，所以在佛教界真正提倡者不多。但是，谢灵运、刘虬高举顿悟的旗帜，在文人中非常有影响力。谢灵运（385—433）与道生的交往，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。但是，道生住在青园寺近二十年左右，而谢灵运在这二十年中或仕或隐，经常来往于建康，元嘉三年（426）至五年在京任秘书监、侍中，则与道生往来的可能性很大。谢灵运著《辩宗论》、《答纲琳二法师》与《答王卫军问》，申述并捍卫道生的顿悟说，可知他受到法勰、僧维、慧麟、竺法纲、慧琳与王弘等多番质疑，亦可见他对“顿悟”的信受与坚持。谢灵运《辩宗论》中述及“新论道士”^[14]，即是指道生。因为王弘与谢灵运多次辩论后，将其问答送示道生，道生《答王卫军书》说：“究寻谢永嘉论，都无间然，有同似若妙善，不能不以为欣”^[15]，肯定了谢灵运对顿悟的理解。这场争论的主要内容，陆澄《法论目录》保存了下列目录^[16]：

《辩宗论》,谢灵运
《法勰问》,往反六首
《僧维问》,往反六首
《慧麟述僧维问》,往反六首
《麟杂(亦作“新”)问》,往反六首
《竺法纲释慧林(亦作“琳”)问》,往反十一首
《王休元问》,往反十四首
《竺道生答王问》,一首
《渐悟论》,释慧观
《明渐论》,释昙无成

并有小注“沙门竺道生执顿悟,谢康乐灵运辩宗述顿悟,沙门释慧观执渐悟”,可见谢灵运对道生顿悟说的弘扬。这场辩论的时间是在永嘉三年(422)七月至景平元年(423),远在《北本》传至建康以前。^[17]当时,谢灵运任永嘉太守,王弘为江州刺史,道生在建康,法纲、慧琳在虎丘,所以这场争辩广及永嘉、虎丘、扬都、江州等地,通过书信与游玩山水的方式,完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有名的争辩。

谢灵运在文学上的成就举足轻重,但是在佛学上的影响远不及刘虬。刘虬(437—495),《南齐书》卷五十四、《南史》卷五十有其传记。刘虬在泰始年中(465—471),任晋平王骠骑记室、当阳令,后来罢官还家,被鹿皮,居茅室,长斋礼诵,精研佛理。萧子良《与荆州隐士刘虬书》说“述善不受报、顿悟成佛义,当时莫能屈。注《法华》等经,讲《涅槃》、大小品等。”^[18]南齐时代,屡征不就,是佛教著名的隐士。刘虬提倡顿渐五时判教,在南北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刘虬的儿子刘之遴,《梁书》卷四十有传。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四收录了他所作的《吊震法师亡书》、《与震兄李敬肅书》、《吊僧正京法师亡书》,卷二十八收录《与印闍梨书》,可见他亦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刘之遴师事法京达五十余年,可见刘虬与法京应该是故交。刘之遴对法京十分赞叹:

若乃五时九部流通解说,匹之前辈,联类往贤,虽什、肇、融、恒、林、安、生、远,岂能相尚。顿悟虽出自生公,弘宣后代微言不绝,实赖夫子。^[19]

刘之遴认为法京才是道生的真正继承者,宣扬顿悟义,但是,法京的传记却被道宣归入《习禅篇》。法京是太原人,后寓居江陵。七岁出家,十三岁与同学智渊升高座,说法无碍。扩建荆州长沙寺,当时誉称天下第一。后来任后梁僧正,统领教团。^[20]传中未提法京弘扬顿悟义,或许是偏重他弘扬禅法而言。

道生的顿悟说受到南朝禅者的重视,法京的第

子有智远、慧嵩,皆是精通经教与禅法的学者。智远(495—571)住荆州长沙寺,至建业,在龙光寺僧绰门下学习经教。梁建安侯萧正立造普明寺,邀请智远住持。后来在慧湛禅师座下学习禅法,住开善寺,陈太建三年(571)卒,世寿七十七岁。^[21]《续高僧传·智远传》中记载,新安寺沙门慧嵩与智远同学,对智远的去世非常悲痛。学者皆把新安寺慧嵩与安州方等寺慧嵩相混淆了,因为安州慧嵩是楞伽师法冲之师,从而建立了道生顿悟说与南宗禅的关系。^[22]但是,安州慧嵩(547—633)比新安寺慧嵩小五十二岁,根本不是同时代的人。

法瑗(409—489),俗姓辛,陇西人。法瑗在梁州沙门竺慧开座下出家,受到慧开的教导,游学于燕、赵、邺、洛等地。当时正逢五胡十六国之乱,社会动荡不安。元嘉十五年(438)归梁州,再赴成都,顺道东行建业,师事道场寺慧观,专心学习大乘及《毗昙》、《成实论》。后来,入庐山修习禅定。刺史庾登邀请出山说法,这时“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,乃敕下都,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”,何尚之听法瑗说法后,感叹说“常谓生公歿后,微言永绝,今日复闻象外之谈,可谓天未丧斯文也”,可见法瑗对道生顿悟义的领悟。宋文帝任命他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。晚年隐居方山,注释《胜鬘经》、《微密持经》,后世流传有《胜鬘经注》三卷^[23]。法瑗对《孝经》、《丧服》非常有造诣,受到当时皇室及王公大臣的推崇。后来出山,住天保寺,任湘宫寺法主。晚年应南齐文惠太子的召请,住扬州灵根寺。《名僧传抄》中有“法瑗夏于灵根讲《华严经》事”^[24],齐永明七年(489)卒,世寿八十一岁。^[25]

从法瑗的生平可以看出,法瑗早年游学于北方,后来至建康而师事慧观。法瑗入道场寺的时间在元嘉二十年前后,慧观是渐悟论者的代表人物,法瑗可能是在建康或庐山学习道生的顿悟义。因为,道生曾两次入庐山隐居,而且圆寂于庐山,所以庐山是涅槃学派的重镇之一。

二、慧观一系的涅槃师

在道生的时代,著名的涅槃学者便是慧严、慧观,他们是渐悟论者的代表人物,在宋文帝的支持下,修治《南本》,弘扬《涅槃经》的思想,尤其是慧观的五时判教,在中国佛教判教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。

慧观^[26],俗姓崔,清河人。十岁即以博学驰名,弱年出家,游学各地。后来师事庐山慧远,听说鸠摩罗什入关,于是前往长安,当时人赞叹说“通情则

生融上首,精难则观肇第一。”撰《法华宗要序》^[27],受到鸠摩罗什的表扬与鼓励。

佛陀跋陀罗到达长安后,慧观又前往学习禅法。佛陀跋陀罗被摈,慧观随他南下庐山。后来,佛陀跋陀罗、慧观一起住道场寺,参与翻译了法显携归的梵本经律《大般泥洹经》六卷、《摩诃僧祇律》四十卷、《僧祇比丘戒本》一卷、《僧祇比丘尼戒本》一卷、《杂藏经》一卷、《华严经》六十卷。所以,慧观在思想与禅法方面,深受佛陀跋陀罗的影响。

慧观在荆州受到刺史司马休之的敬重,为他建立高惺寺。义熙十一年(415)三月,宋武帝讨伐司马休之,平定了江陵,于是慧观与宋武帝相会,二人结下深缘。永初二年(420),刘义隆(即后来的宋文帝)为荆州刺史,在江陵与慧观知交,慧观受到宋文帝的重视,即始于此时。后来,慧观前往建康,驻锡道场寺,从而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弘法生涯。

慧观在宋文帝的支持下,推动与开展了刘宋时代的译经活动。求那跋摩(367—431)在慧观的邀请下,于元嘉八年(431)正月抵达建康,住祇洹寺,译出《菩萨善戒经》十卷,翻译、校订了《杂阿毗昙心论》十三卷。僧伽跋摩于元嘉十年到达建康,慧观专程迎僧伽跋摩到道场寺接受供养,二人共建三层塔。又依焦镜《后出杂心序》记载,元嘉十一年(434)九月,于建康长干寺,僧伽跋摩出论,宝云译语,慧观笔受,经过一年重新译出《杂阿毗昙心论》。^[28]昙摩密多(356—442)于元嘉年间,在道场寺译出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一卷,与慧观或许有关连。^[29]求那跋陀罗(394—468)泛海至广州,宋文帝派慧观、慧严在新亭郊迎。求那跋陀罗在道场寺译出《央掘魔罗经》四卷、《楞伽经》四卷,慧观任笔受,“往复咨析,妙得本旨。”^[30]慧观《胜鬘经序》说:

外国沙门求那跋陀罗手执正本,口宣梵音,山居苦节,通悟息心。释宝云译为宋语,德行诸僧慧严等一百余人,考音详义,以定厥文。大宋元嘉十三年,岁次玄枵八月十四日,初转梵轮,讫于月终。^[31]

慧观、慧严于436年八月,与求那跋陀罗一起译出《胜鬘经》。求那跋陀罗译出《楞伽经》、《胜鬘经》对中国佛教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,慧观思想的转变,或许与求那跋陀罗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慧观通晓老庄,尤精《十诵律》,根据律中的轻重遮遣,著《杂问律事》,流行于世,当时人称“卑罗鄙语,慧观才录”^[32]。同时,慧观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,与琅琊的王僧达^[33]、庐江的何尚之时有交往。

《高僧传》对慧观的歿年记载不清,但是《历代

三宝记》卷十记载“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四卷,元嘉二十年,于道场寺译,慧观笔受,见道慧、僧祐、法上等录。”^[34]可见,元嘉二十年(443)译出《楞伽经》时,慧观仍然担任笔受。《高僧传·宝云传》说:

顷之道场慧观临亡,请云还都,总理寺任。云不得已而还,居道场岁许,复更还六合。以元嘉二十六年终于山寺。^[35]

慧观于元嘉(424—453)年间入寂,世寿七十一。现存著作有《法华宗要序》、《修行地不净观序》、《胜鬘经序》,其余如《辩宗论》、《论顿悟渐悟义》、《十喻序赞》等未传于世。然陆澄《法论目录》收有慧观著《渐悟论》、“沙门释慧观执渐悟”^[36],或许《渐悟论》即是《辩宗论》。

渐悟论的思想是当时建康佛教界的一般通行观念,这是当时毗昙学盛行的结果。在渐悟、顿悟对峙的年代,渐悟论者继承了长安佛教的思想潮流,在东晋末期至刘宋初期(元嘉年间),二派皆盛极一时。

昙无成^[37]亦是鸠摩罗什的弟子,扶风(陕西咸阳)人,俗姓马,十三岁出家,至长安从学于鸠摩罗什,受到后秦姚兴的殷厚供养。后来因为长安的战乱,于是南下,住于淮南的中寺,讲说《涅槃经》及《大品般若经》。曾经与颜延之、何尚之一起讨论论实相义,著有《实相论》、《明渐论》、《申无生论》等。于元嘉年中(424—453)示寂,世寿六十四岁。

僧弼^[38](365—442),吴(江苏苏州)人,年少时与龙光寺昙干一起游学于长安,随鸠摩罗什学习经论,受到鸠摩罗什的赞赏而允许参与译经。后来南下居楚州、郢州地区十余年,盛弘教化于江南地方。河西王沮渠蒙逊闻其德望而礼重之。曾经写信给宝林,赞叹佛陀跋陀罗“斗场禅师甚有大心,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。”^[39]晚年东出杨都,住于彭城寺,深受宋文帝器重,多次延请他讲说义学。元嘉十九年(453)示寂,世寿七十八岁。吉藏《中观论疏》曾引用僧弼的著作《丈六即真论》^[40]。“如月在高天影现百水,水清则像现,水浊则像隐,缘见有生灭,佛实无去来。”^[41]陆澄《法论目录》收有僧弼《问释慧严法身二义》^[42],僧弼关注佛身问题。宋文帝引述道生的顿悟义,僧弼则问难反驳^[43],可见僧弼属于渐悟论系统。

僧镜^[44]本为陇西(甘肃省陇西县)人,后来移住江南。他崇尚孝道,侍候母亲。其母去世后,出家为僧,住在吴县华山。后来入关中、陇西一带,求师游学,数年后,回到建康。徐湛之请为门师,极为尊崇。僧镜弘法于三吴地区,先后住苏州台寺、上虞徐山等地。谢灵运与他交往,当时谢灵运所敬重的昙

隆亦住在徐山。僧镜奉宋孝武帝的敕命,住在下大林寺。其亦曾与僧璩就顿悟、渐悟进行辩论,可见为渐悟论者。宋元徽中(473—477)卒,世寿六十七。僧镜著有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泥洹经》等义疏及《毗昙玄论》等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收有“焦镜法师”著《后出杂心序》,《释文纪》卷十六记为僧镜,并且解释僧镜俗姓焦,故称焦镜。《后出杂心序》说“镜以不才,谬豫听末,虽思不及玄,而时有浅解。”^[45]这表明焦镜曾参与《杂阿毗昙心论》的翻译,而且曾有注解,即是《毗昙玄论》。可见,僧镜是慧观的学生辈人物。另外,元康《肇论疏》曾引用僧镜《实相六家论》,概括当时佛教界对空有的六种观点。^[46]

谢灵运《辩宗论》、《答纲琳二法师》、《答王卫军问》,记载了当时顿渐之争的问答,申述并捍卫了“顿悟”主张,法勰、僧维、慧麟、法纲、慧琳、王弘等人则呈现了渐悟论的特色。

在这六人中,法勰、僧维、慧麟的生平未知。依慧琳《武丘法纲法师诔》^[47],法纲为河南武丘人,俗姓殷,年少时出家于建康,游学于河南、湖北各地,曾隐居虎丘,歿于庐山,于元嘉十一年(434)十一月示寂。僧伽提婆讲《阿毗昙》,法纲评价说“大略全是,小未精核耳。”^[48]可见,法纲对毗昙学非常有造诣。

慧琳,秦郡秦县(江苏省六合县)人,俗姓刘,是道渊的弟子,与谢灵运(385—433)、颜延之(384—456)同时代的人。《续高僧传·道渊传》记载,道渊在建康东安寺出家,少年持律,学习经教,后来于东安寺开讲,学徒众多。宋文帝尊崇道渊,敕住彭城寺。^[49]慧琳少年出家,住建业冶城寺,博通佛教各家经典,兼及儒家和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等,性格诙谐乐观,而且傲慢自矜。一次,慧琳在傅亮家闲坐,适值道渊前来拜访傅亮,慧琳见道渊前来,竟不为致礼,惹得道渊大怒,形于颜色。傅亮见状,也责备慧琳,罚打他二十棍杖。这件事,反映了慧琳傲诞矜夸的性格。《宋书》卷九十七说:

慧琳者,秦郡秦县人,姓刘氏。少出家,住建业冶城寺,有才章,兼外内之学,为庐陵王义真所知。^[50]

冶城寺在建康的西北,当时高僧汇聚,如慧琳、慧静、僧瑾、慧通、智顺、智秀、僧若、道乘等人皆住此寺。

慧琳的才学受到朝廷权贵的赏识。他曾与名士谢弘微交游,又受到宋武帝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的知重。刘义真有夺取帝位的野心,曾说:得志之日,将以谢灵运、颜延之为宰相,慧琳为西豫州都督。宋少帝景平二年(424),庐陵王刘义真得罪被废,颜延之、谢灵运都被贬黜,慧琳也受牵连,在京容身不

得,一度离开了建业。但不久他又回到京城,约于宋文帝元嘉十年(433)前后,著《白黑论》(又名《均善论》),以白学先生与黑衣道士问答的形式,论述佛教与儒学的异同。慧琳的论文在士大夫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衡阳太守何承天赞成慧琳的观点,著《达性论》,阐述儒家义旨,批驳佛教的“众生”说和生死轮回理论;宗炳和颜延之则分别著《难白黑论》和《折达性论》,与慧琳、何承天展开激烈的辩难。这场论战之后,慧琳受到宋文帝的信用,文帝之后,又为宋孝武帝“雅重”,逐渐参与权要,朝廷大事都与他商议,当时号为“黑衣宰相”。

慧琳的著作、书信等现存有:

(1)《均善论》(或名《白黑论》),见录于《宋书》卷九十七《夷蛮传》;

(2)《武丘法纲法师诔》,收于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;

(3)《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》,同上;

(4)《释慧琳问》(谢灵运《辩宗论》附),收于《广弘明集》卷十八;

(5)《论语琳公说》(存题名),收于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“经编论语类”^[51]。

散佚的著作,见于《高僧传·慧琳传》的有《孝经注》、《庄子·逍遥篇注》,见于陆澄《法论目录》的有《何彦德《断家养论》附)释慧琳难》、《婚农无伤论》、《顾长康《证极明化论》附)问论》^[52]。

王弘(379—432),字休元,琅邪临沂(今山东临沂)人,是王珣的儿子。元嘉九年(432)进位太保,卒年五十四,谥文昭。他在书法艺术上非常有成就,后人多模仿。王弘曾与范泰、颜延之一起问道于道生,在谢灵运《辩宗论》中,亦提出了解答的书信。

慧严、慧观二人的生平有相似之处,而且二人共同弘扬《涅槃经》,对刘宋时代的佛教贡献甚大。慧严(363—443)^[53],俗姓范,豫州(安徽寿县)人。十二岁为诸生,博晓诗书。十六岁出家,深究佛理。闻鸠摩罗什至关中,于是前往随罗什受学。鸠摩罗什示寂后,他回到建康东安寺,甚得宋高祖器重。宋文帝即位后,经常向他请示佛法。当时,颜延之著《离识观》及《论检》,宋文帝让慧严辨其异同,慧严后来著《无生灭论》及《老子略注》。同时,慧严参与当时的建康译场,与慧观、谢灵运一起修治了《南本涅槃经》。元嘉二十年(443)卒,世寿八十一。宋文帝下诏“严法师器识渊远,学道之匠,奄尔迁神,痛悼于怀,可给钱五万布五十匹。”可见,慧严在当时建康佛教界的影响力。

慧严的弟子法智,擅长《成实论》和《大小品

经》。《大般涅槃经集解》中引用了法智《涅槃经疏》,或许法智继承了慧严的涅槃学,著有《涅槃经疏》。

慧观的传承,在南朝一直延续到梁代,智秀、慧超皆传其法脉。

智秀(440—502)^[54],京兆人,俗姓裘,寓居建康。投蒋山灵耀寺出家,受具戒后,遍访诸师。《高僧传·道营传》说“释道营,未详何人,始住灵耀寺习禅,晚依观、询二律师谘受毗尼,偏善《僧祇》一部,诵《法华》、《金光明》,蔬素守节,庄严道慧、治城智秀皆师其戒范。”^[55]可见,道营即是智秀的师父。而“观、询二律师”即是慧观、慧询。《高僧传·慧询传》记载^[56]慧询(375—458),赵郡(河北赵县)人,俗姓赵。幼年出家,游学长安,从鸠摩罗什受学。精研经论,尤精通《十诵律》、《摩诃僧祇律》,并述作章疏。永初(420—422)年中,至广陵大开律席。元嘉(424—453)年间,住京师道场寺,后来受慧观的邀请,移住长乐寺。大明二年示寂,世寿八十四。

智秀通达大小乘经论,兼明《毗昙》、《成实论》,最擅长《涅槃经》、《净名经》、《般若经》。南齐竟陵王招请他讲经,后来回建康,住灵根寺。天监初年(502)卒于冶城寺,世寿六十三。智秀著有《涅槃经义疏》,收录入《大般涅槃经集解》,传中赞叹说:“为人神彩细密,思入玄微,其文句幽隐,并见披释。”智秀有弟子慧超。

慧超(475—526)^[57],太原人,俗姓王。永嘉之乱,寓居襄阳。七岁依檀溪寺慧景出家,次年,从僧崇禅师学习禅定。十二岁时,又随同寺的僧人学习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易经》。竟陵王请智秀讲经时,慧超前往受学。后随智秀入京,住灵根寺,在智秀座下乞受具足戒,通达戒律的思想要义。天监初年(502)智秀去世后,依智藏问学,于是通达大小乘经、律、论,名震建康。后又依慧集学习戒律,在戒律上深有造诣。梁武帝敕任为“寿光殿学士”,又敕令与僧伽婆罗共译《阿育王经》,慧超任笔受。后屡应请出京弘化,学者称咏不绝。普通七年(526)入寂,世寿五十二。

渐悟一系亦是出自鸠摩罗什所传的龙树思想,而且受到当时的《毗昙》、《成实论》的影响,这是当时建康佛教界的通行看法。如与道生辩论的智胜,来自于闽,可见当时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力。

三、庐山一系的涅槃师

庐山慧远邀请僧伽提婆译出《阿毗昙心论》与《三法度经》,热心于毗昙学的研习。所以,庐山一

系深受毗昙学的影响,而道生后来隐居庐山,道生的顿悟说对庐山一系自然产生影响。

昙顺(346—425),黄龙人,少年即师事鸠摩罗什,后来又以慧远为师。生平蔬食而具德性,南蛮校尉刘遵在江陵造立竹林寺请住。^[58]僧慧(408—486),皇甫谧族人,少年出家,依昙顺为师,专心研究经论。二十五岁时,能讲《涅槃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十住经》、《净名经》、《杂心论》;同时,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,与宗炳、刘虬等友善,受到宗炳的赞誉。齐代初年,昙顺为荆州僧主,匡正僧团戒律。当时号称为“秃头官家”,与玄畅并称为“黑衣二杰”。齐永明四年(425)卒,世寿七十九。弟子有慧敞,代僧慧为僧主。^[59]

道汪(?—465),河北长乐人,俗姓潘。十三岁,在庐山慧远座下出家,“研综经律,雅善《涅槃》。”闻玄高禅慧高深,于是前往访求。因为战乱,转住成都,征士费文渊为他建立祇洹寺,教化盛行于巴蜀。宋孝武帝征诏,固辞不往。后来,应刘思考邀请,建立寺院。王景茂请为武担寺僧主,宋明帝泰始元年(465)卒于武担寺。^[60]道汪对《涅槃经》的研究,或许受到道生的影响。

法庄(385—460),淮南人。十岁出家,为庐山慧远弟子。后游学关中,从慧睿学习。元嘉初年,住道场寺,诵《大涅槃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净名经》。大明初年(460)卒于道场寺,世寿六十七岁。^[61]法庄与慧观同住道场寺,其思想则难界定。

慧静(412—469)^[62],俗姓邵,吴兴余杭人。游学于庐山,后来回建康继续学习。慧静精通内典、外典,尤精于《涅槃经》。慧静住在冶城寺,颜延之、何尚之敬慕他的道德学问,颜延之赞叹说“荆山之玉,唯静是焉。”颜峻任东扬州刺史,慧静随他同行,住天柱山寺。大明年间(457—464),迁居剡(浙江省嵊县)的法华台,又住东仰山弘法修行。依《续高僧传·慧约传》,慧约师事“南林寺沙门慧静”,知慧静曾居南林寺。《高僧传·慧静传》记载慧静于泰始中(466—471)圆寂,年五十八。依《续高僧传·慧约传》记载,慧约于泰始四年(468)在慧静座下出家,一年后,慧静逝世,可知慧静的卒年为泰始五年(469)。著有《文翰集》十卷,陆澄《法论目录》收有“释慧静”《佛性集》^[63],或许即是天柱慧静的著作。

慧约(452—535)^[64],《续高僧传》卷六有本传,另清代严可均校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收有王筠《国师草堂寺智者约法师碑》。东阳乌伤人,俗姓娄,字德素。慧约的一生多诸神异,有诸多异梦、征应等神话故事。十二岁即遍礼塔庙,潜

究经典。刘宋泰始四年(468),十七岁,于上虞东山寺出家,师事慧静。后又随慧静住剡县梵居寺,一年后慧静示寂,为尽心丧之礼,乃栖止山岩。齐竟陵王萧子良赞叹有加,誉为“释门领袖”。后应齐中书郎周顒之请,住持钟山草堂寺,为齐世贵胜所崇。齐太宰文简公褚渊、太尉文宪公王俭,视慧约为“菩萨”,而从其受戒。褚渊邀请慧约讲《净名经》、《胜鬘经》,王俭请讲《法华经》、《大品经》等。所居之处,灵异屡见。约在天监十一年至十八年(512—519),梁武帝编撰完成《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》,详细记载有关受菩萨戒的理论依据、仪式规范、戒条、戒场布置等项目。^[65]于此期间,梁武帝聘请慧约为“智者国师”。天监十八年(519)四月八日,梁武帝请慧约担任菩萨戒法师,正式成为“菩萨戒弟子皇帝”。大同元年(535)九月,劝众“勤修念慧,勿起乱想”,言毕合掌入寂,世寿八十四。敕葬于独龙山志公塔之左。

四、结语:顿渐兼容思潮的形成

刘宋初期的涅槃学派,是以建康道场寺、龙光寺为中心。刘宋后期以新安寺最著名,法瑗、昙斌、道猷大约同时住此寺;其次,是中兴寺、庄严寺、灵味寺、冶城寺等,中兴寺有僧璩、慧定,僧璩亦住庄严寺,僧含止灵味寺,慧静住冶城寺,静林住多宝讲寺。而其他各地的涅槃师,如昙济在寿春,僧庄在荆州,超进在会稽,道汪在成都。北方由于北魏太武帝灭佛,而且姚秦和北凉的灭亡,佛教失去王朝的外护,导致北地佛教徒纷纷避难南方。另外,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北朝早期的僧人亦有不足,故难见《涅槃经》的弘扬。

宋文帝邀请道猷、法瑗弘扬道生的学说,都与慧观有直接的联系。可见,慧观虽然在思想上与道生有所不同,但是对道生的学说仍然十分推崇;或许,晚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另一方面,渐悟、顿悟论争的时代,始于道生、慧观时代;但是,道生去世后,唯有宝林、法宝留在龙光寺弘扬其说;道猷应宋文帝之诏,开演顿悟义,受到时人的论难。在孝武帝时代,顿悟义得到复兴。可见,道生的顿悟义是独特异出的天才思想,纯粹的顿悟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难以接受的,反而是顿渐兼容成为南朝佛教思想的主流,顿渐思想是南朝判教的根本特点。顿渐兼容的形成,综合了道生的顿悟与慧观的渐悟,从而成为南朝佛教的教理组织。

参考文献:

[1]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,《大正藏》第52卷,第269页。

[2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道猷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374页下。

[3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九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67页中-下。

[4]鎌田茂雄以为同一人,见《中国佛教通史》(第四卷),佛光出版社译,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版,第306页;布施浩岳认为法慈与道慈为二人,见《涅槃宗の研究・后篇》,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年复刻,第31页。

[5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九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64页上。

[6]《名僧传抄》,《卍新纂续藏经》第77册,第354页中。

[7]《高僧传》卷七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367页上。

[8]《二谛义》卷下,《大正藏》第45卷,第111页中。

[9]《高僧传》卷十一《僧璩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401页上-中。

[10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13页上。

[11]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四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261页上。

[12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84页下。

[13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僧谨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373页下-374页上。

[14]《广弘明集》卷十八,《大正藏》第52卷,第225页上。

[15]《广弘明集》卷十八,《大正藏》第52卷,第228页上。

[16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84页中。

[17]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(下册)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439页。

[18]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九,《大正藏》第52卷,第233页上。

[19]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四,《大正藏》第52卷,第276页上。

[20]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法京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556页中。

[21]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智远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556页上。

[22]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(下册),第484页;鎌田茂雄《中国佛教通史》(第四卷),第310页。

[23]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四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263页下。

[24]《名僧传抄》,《卍新纂续藏经》第77册,第361页上。

[25]《高僧传》卷八《法瑗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376页下-377页上。

[26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慧观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333页下。

[27]收入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57页上-中。

[28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74页中-下。

[29]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卷三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386页中。

[30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求那跋摩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344页中。

[31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九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67页中。

- [32]《高僧传》卷二《卑摩罗叉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33页下。
- [33]《宋书》卷七十五《王僧达传》：“义庆闻如此，令周旋沙门慧观造而观之。僧达陈书满席，与论文义，慧观酬答不暇，深相称美。”第1951页。
- [34]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，《大正藏》第49卷，第91页上。
- [35]《高僧传》卷三《宝云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40页上。
- [36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84页中。
- [37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昙无成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70页上-中。
- [38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僧弼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69页上-中。
- [39]《高僧传》卷二《佛驮跋陀罗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35页下。
- [40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所收陆澄《法论目录》记载，僧肇著《丈六即真论》。（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83页下）
- [41]《中观论疏》卷一末，《大正藏》第42卷，第17页下。
- [42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83页下。
- [43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竺道生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67页上。
- [44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僧镜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73页中-下。
- [45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74页下。
- [46]《肇论疏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5卷，第163页上。
- [47]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，《大正藏》第52卷，第265页中-下。
- [48]《高僧传》卷一《僧伽提婆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29页上。
- [49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道渊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69页上。
- [50]《宋书》卷九十七《夷蛮传》，第2388页。
- [51]转引自鹤饲光昌《刘宋の慧琳について》，《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》第82号，1998年，第87页。
- [52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85页上。
- [53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慧严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67页中-368页中。
- [54]《高僧传》卷八《智秀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80页下-381页上。
- [55]《高僧传》卷十一《道营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01页下。
- [56]《高僧传》卷十一《慧询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01页上。
- [57]《续高僧传》卷六《慧超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75页上-中。
- [58]《高僧传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63页上。
- [59]《高僧传》卷八《僧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78页中-下。
- [60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道汪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71页下-372页上。
- [61]《高僧传》卷十二《法庄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07页中。
- [62]《高僧传》卷七《慧静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372页上。
- [63]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83页上。
- [64]《续高僧传》卷六《慧约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，第468页中-470页上。
- [65]诹访义纯《中国南朝佛教史の研究》，京都：法藏馆，1997年，第85-402页。

（责任编辑：胡晓明）